

## 晚清政治和军事地理的变动及对新疆的影响

## ——以满权汉移和国防战略转换为例

刘超建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晚清时期,由于皇权与地方权利发生了冲突,引起了国防战略的转移,由传统的“重塞轻海”转变为“重海轻陆”的边防政策。实践证明,这一转变对新疆地区社会的稳定和边防安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晚清;政治地理;军事地理;海防;塞防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2)02-0055-04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右高原、左大海”的“大陆—海岸型”的地缘优势已不存在,北部塞防、东南海防同时受到外敌的侵略。更为严重的是,国内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尤其到咸丰朝时,清政府的国力日趋衰弱。而同时,汉族地方势力兴起,并逐渐控制了地方事权,这不仅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使其传统的边防观念由“重塞轻海”转变为以海防为主。很显然,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

### 一、皇权的削弱

清王朝定鼎北京后,建立了满汉官僚联合统治的政权。这一政权是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各统治机构紧密联合,形成了一个由内向外辐射的统治网。在强大的皇权面前,六部无权,世人尽知。但是,到了咸丰、同治两朝时,这种情况却幡然改观。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需要大力开拓经济和工业原料的国际市场,不断地向外推行殖民扩张。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传统的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的地缘优势已无法存在。

第二,国内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像白莲教起义、陕甘回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新疆张格尔叛乱等,使清政府的统治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嘉道以来乱事尤炽,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竟使清廷,穷于应付”。<sup>[1]</sup>

以满族为主的中央机构由于人口数量少,到后期能够堪当国家大任者更是寥寥无几,不得不启用大量的汉族官员来镇压上述农民起义。尤其是咸丰元年的太平天国起义,给予了曾国藩以成就湘军的历史机遇,从而使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势力不断壮大,逐渐走上了与清政府相抗衡的道路。这也迫使清政府不断地向其妥协和退让,导致了满汉政治权势的重新分配。

第三,满族在近代人才匮乏。除了人数少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满族政治上的优越性,譬如仕途太广,进身太易,导致满族政治人才缺乏历练。故在太平天国时期,满族贵族为钦差者多难当大任。这一点,就连身为满族贵族的肃顺也不得不发出“满族没有一个人大中用,国家遇大变故,非重用汉人不可”的感叹。<sup>[2]</sup>太平天国运动的不断发展,对清政府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时,很多满族大臣提出重用汉人的呼声越来越高。军机大臣文庆曾于御前进言,谓当重用汉臣:“彼辈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而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呼”。<sup>[3]</sup>咸丰六年,肃顺力主重用汉臣。郭嵩焘、陈孚恩、左宗棠等著名人物,都入其范围。而郭嵩焘等又都是曾国藩、左宗棠、胡雪岩等人的好友,肃顺以此深知三人,遇事则维护之。咸丰九年,樊燮控告左宗棠以幕宾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但此事后来未对簿公堂就不了了之,即与肃顺启齿奏保有很大的

收稿日期:2011-10-27

作者简介:刘超建(1981-),男,山东阳谷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历史地理学博士研究生。

关系。肃顺死后,奕訢继承其衣钵,维持其间。可以说,像文庆、肃顺、奕訢这样在当时清廷中有重大影响力的满族要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汉族疆吏在中央的代言人。

第四,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资本家的支持也是汉族官员敢于与清朝中央相抗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首先是来自于海上,满族官员又不乐于与西方国家的官员打交道,沿海地区的政府官员大都委派汉族人士来担任。这样,由于利益上的原因,汉族官员与西方势力结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因此,西方一些国家不断地向当时的汉族大员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譬如,当太平天国失败既成定局时,就有西方国家领事曾向曾国藩提出与清政府划江而治的建议,东南地区的督抚在义和团运动时提出与清政府政策“相悖”的互保政策,就是很好的明证。

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一向自诩为“乾纲独断”、“废除大柄”的封建帝王,就连自认为非诸臣所可轻议的咸丰皇帝,在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一切规划,皆言听计从。”<sup>[4]</sup>

太平天国后期,曾国藩的势力大大膨胀,与皇帝的权利被迫下移有关。有史料为证:咸丰末年,朝廷一般不敢轻易决断大事,就连镇压太平天国的“借师助剿”决策,也因其未谙情伪,不晓利害,只好委派薛焕、曾国藩、奎昌、胡雪岩等廷臣议决。朝廷也不敢随意干涉疆吏的所作所为,只能委之以军政决断权,并一再声称“不为遥制”。“但于剿匪有裨,朕必不为遥制”。<sup>[5]</sup>这样,就造成了疆吏们各行其是,视朝令如具文的状况。同治三年,太平军占领的苏州、杭州先后被清军攻陷,天京遂成为一座孤城,清中央满族大员求胜心切,急令曾国藩亲往天京城外督战。但是,曾国藩心中另有打算,因此,他稳坐安庆,按兵不动,就是皇帝对他也毫无办法。清廷转而谕令李鸿章“迅调劲旅数十营前往金陵会剿”,而曾国藩害怕李鸿章分了其弟曾国荃的功,所以,就以金陵兵营缺粮,若来请“携饷相遗”为词,抵触朝廷,吓得李鸿章也只好裹足不前,朝廷只好听之任之,别无办法。<sup>[6]</sup>

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为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势力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再加上清中央以文庆、肃顺、奕訢等为首的满族贵族重用汉臣的呼声,遂导致咸、同时期,权力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清代职官年表》统计,满汉总督的比例:1842年为10:8,1860年为6:9,1870年为2:12;同时期满汉巡抚的比例分别为3:14、6:18、1:20。以上数据足以说

明,满权汉移的倾向,其中最引人注目是1864年,满汉巡抚比例为0:17<sup>[7]</sup>,以后虽有满族人担任巡抚,也至多如同点缀。尤其到咸丰十年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铭传等人相继成为封疆大吏,掌握了地方实权,致使皇权被严重的削弱。

## 二、国防战略的转移

综观中国古代的历史,由于半封闭的“沿海—大陆型”地缘的关系,边患主要在北疆,没有哪一个王朝被来自海疆的侵略所击败,但北疆的威胁却是历朝都有的,所以,“历代边防,重在北方”。<sup>[8]</sup>这在清前期,尤为突出。清王朝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更将卡伦安设在北疆的每一个角落。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时,“郡王策凌、伯四格、侍郎图理琛等与俄罗斯划界大臣萨瓦勘定疆界,并设五十九座卡伦,极东之设十二卡伦,就近属黑龙江将军管辖,轮派索伦官兵戍守,迤西之卡伦四十有七,以喀尔喀属下蒙古按其游牧之远近,每卡伦安设章京一员,率领兵丁皆令携眷戍守”。<sup>[9]</sup>平定准噶尔后,“乾隆二十四年,勘定准部,北路重地,分兵设防,山川隘口,悉置卡伦台站。”<sup>[10]</sup>形成了北疆卡伦的整体防御体系。在北部边疆自东向西分别设有黑龙江将军、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伊犁将军等,并由满、蒙人士担任要职,目的就是这种防御体系,来制约内地汉族,防止外敌的入侵,维护自己的统治。

然而,道、咸以来,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海战纷至沓来,在近代中国百余年来,“来自海上的外国入侵竟达四百七十多次”。<sup>[11]</sup>海上的炮舰取代了草原上的战马,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相继崛起,中国传统地缘的天然屏障已不复存在;其次,近代轮船航运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帆船已被蒸汽船代替,从西方到中国,其海上航程大大缩短;再次,来自于北部的威胁相对削弱。对于前两个方面,人们都会取得一致性的认可。而对来自北部的威胁相对削弱的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实际上,当时,一方面俄国国内的农奴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已威胁到了沙皇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俄土战争中,俄国与弱小的土耳其胜负参半的结果向世人昭示了沙俄江河日下的地位。另外,1867年3月,俄国因为俄美公司商业上的失败,政府无力保护在美洲的殖民地抵御外来的攻击,不得不将总面积约58万平方公里的俄属美洲(包括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殖民地)出售给美国,售价720万美元。<sup>[12]</sup>俄国把美洲的殖民地出卖

给美国,真正的意图是以此来拉拢美国,以达到联美制英的目的。19世纪70年代,英国对我国西藏和新疆的侵略,遏止了俄国的对外扩张。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不仅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从西北陆路转向了东南海疆,而且在来自海上的敌人中,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隐患,从而得出海防应该主要针对日本的这一结论。从甲午战争到后来的抗日战争,事实一再说明了李鸿章这一预言的正确性。我们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具有较高的战略眼光。虽然期间发生了阿古柏入侵新疆的事件,但它并没有对中国国家命运构成根本威胁。在这一点上,连力主塞防的左宗棠也认为李鸿章的主张出于“人臣谋国之忠,非一己之私见”。<sup>[13]</sup>另外,从近代历史上看,两次鸦片战争及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大都占领北京或其周边。此时的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海防也是急需。而沿海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大都是汉族官僚,凭借湘系集团的势力,可以与清政府相抗衡,在地方上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也呼吁加强海防。其目的应该有三:其一,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利益,这是勿容置疑的;其二,维护自己在地方上的统治地位;其三,迎合西方资本家在我国利益的需要。因为这些人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丰厚的资产,加强海防以利于防止沿海地区的农民起义。当然,加强海防也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有很大的关联。而且,他们的主张也与清统治者不谋而合。所以,李鸿章专顾海防的主张便得到朝廷内外一些官员的支持,醇亲王奕环也认为“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sup>[14]</sup>其他朝廷重臣如刑部尚书崇实,御史余上华、刑部左侍郎黄钰,地方督抚如山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等也都赞成李鸿章的主张。因此,国防战略中心的转移就成为必然。

### 三、对新疆的影响

光绪元年(1875)五月三十日,清廷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还授以南、北洋大臣购买船炮,提拨饷需,保奏人才等事权。可见,其所强调的海防关系之紧要,即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于国家久远之图,表明海防重要地位已被清朝最高当局所认同,清朝的国防战略和政策由传统的“重陆轻海”转向以“海防为主”。基于此,落实海防经费,确保近代化的海防建设也就提到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经费向粤海关、江海关和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六省厘金关税中拨出,每年四百万两,<sup>[15]</sup>而这些地区正是新疆协饷的主要来源地,这就大大限制了对新疆协饷的调拨。为了发

展海军,清政府还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如李鸿章创立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左宗棠创立的福建船政局等;二是大量外购新型军舰。特别是大舰巨炮,继“超勇”、“扬威”两舰之后,又购进了轻型巡洋舰,光绪七年(1881)订购两艘7335吨的大型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中法战争后,订购的战舰,排水量都在2300吨到2900吨,舰炮为210毫米和150毫米口径的巨炮。并装备鱼雷发射管,其装备都令当时的日本羡慕不已;三是培养了大量的海军人才。继光绪三年(1877)派出的第一批38名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轮船驾驶和机械制造后,光绪八年(1882)又派出了第二批留学生。此外,在国内还兴办了几所培养海军人才的学校。中国海军从无到有,再到其实力居世界第四位,足可以说明清朝在海防上的花费之巨。

与海防建设花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北塞防,自乾隆年间形成的协饷定制,到同治年间,新疆协饷已经枯竭,“新疆各地经费及协甘兵饷,几到无从筹拨,若非设法变通,断难经久”。<sup>[16]</sup>此后,新疆各地驻扎大臣有关“待饷迫切,兵饷久竭,甚至营兵纠众乞饷,胁官索饷等催解经费的折报连年不绝。”对此,清政府也无力顾及。<sup>[17]</sup>一是大量的经费被用于海防建设;二是中央对地方控制弱化;三是镇压内地农民起义,花费了大量的军费。清政府仅镇压太平天国所花的军费为34000余万两。<sup>[18]</sup>这种情况,使清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这对新疆社会的稳定和边境的安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起,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多次侵扰新疆,张格尔之乱虽最终被平定,但清政府因此在新疆陷入了“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以度支的”困境。<sup>[19]</sup>由于清政府没有实力对和卓势力给予致命的打击,致使新疆动乱不止,先后发生了玉素甫之乱、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同治三年(1864)的农民起义及阿古柏的入侵。1871年春,沙俄以防止新疆动乱为借口,派兵侵入伊犁地区。

在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过程中,腐败的清政府在外有大军压境,内有人民起义的情况下,认为“综核通盘形势,边界既属一无可是,自不得不从权放宽一步,以期早为藏事。”<sup>[20]</sup>“如不按沙俄的分界议单办理,将来兵连祸接,必致更难收拾。”<sup>[21]</sup>咸丰十年(1861)六月十九日,在兴凯湖与穆棱河之间的分水界上设置第二个界牌,当经决定:由杜尔宾大尉巡视边界,以便实行测量沿边地带和设置界碑,但杜尔宾大尉在巡视国界的时候,没有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中国的官员。<sup>[22]</sup>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清政府治

理边疆政策的转移有极大关系。

到19世纪80年代,满权汉移和国防战略转移已成定局,而这一转移对新疆的政治和军事地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新疆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清政府原有的政治制度已经不适应治理新疆的需要。因此,在左宗棠、刘锦棠等人的呼吁下,清政府被迫于1884年在新疆建省。废除了伯克制度,实行了与内地统一的郡县制度。这对新疆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的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使新疆城市实现了由军城到屯城再到治城的转变。

#### 四、结语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国防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以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僚和满族贵族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加强海防而忽视了塞防,致使边疆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受到极大的影响。综观晚清时期一些政治和军事地理的变动,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但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由于协饷制度的形成,新疆的财政一直都依赖于清中央,阻碍了新疆本地的经济发展,这是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才能稳定。尤其是当前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新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加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陆地周边国家的关系,努力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所有这些政策的制定,都有赖于对清代治边政策的借鉴。

#### 参考文献:

- [1]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330.
- [2]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A].范文澜历史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67.
- [3]吴相湘.晚清宫廷纪实[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5
- [4][5][清]蒋良骥.咸丰朝东华录[Z].北京:

中华书局,1980:3.15-29.

[6][清]蒋良骥.同治朝东华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0:5-6.2.

[7]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0:1465.1475.1481.1686.1703.1712.1707.

[8]戴逸.李鸿章全集[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345.

[9]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0[M].台湾:文海出版社.

[10]赵尔巽.清史稿·卷131[Z].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吴杰章,等编.中国海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1.

[12][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著.杨诗浩,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97.

[13]张侠,杨志本.清末海军史料·上册[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221.

[1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116.

[15]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385.

[16]清文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77:332.

[17]苏德毕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的政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46.

[18]彭泽益.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和财政搜括的加剧[A].历史学,1979,(2).转引自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汇编《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C].北京:中华书局,378.

[19]魏源.圣武记·卷4[Z].北京:中华书局,1984.

[20][2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卷22[Z].北京:中华书局,1964.

(下转第63页)

[13] 陆离, 陆庆夫. 再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J]. 转引自藏学学刊第5辑[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14] 五世达赖喇嘛, 著. 刘立千, 译. 西藏王臣记[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17] 巴卧·祖拉陈哇, 著. 黄颢, 译. 《贤者喜宴》摘译九[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2, (4).

[18] 王尧, 陈践. 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C].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

[19] 巴卧·祖拉陈哇, 著. 黄颢, 译. 《贤者喜宴》摘译七[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2, (6).

(责任编辑 杨卫)

## The Cause Analysis of Military System of Tibetan Regime

HE D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ferences, the paper makes a systemic analysis on the cause of Tibetan Regime's military system. It argues that it i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natural conditio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pastoral economy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 that affect the cause of Tibetan Regime's military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politics; Tibetan Regime; Military system

(上接第 58 页)

1973:88.

[22][俄]伊. 费. 巴布科夫, 著. 王之相, 译. 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 陈柏萍)

##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eography Transform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Influence on Xinjiang ——Take right's transformation and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shifting for example

LIU Chao-jian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of imperial power and local righ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formed. The frontier policy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ay attention to border defense but despise coast defense" to the "think highly of sea defense but disdain border defense". Practice proves that the policy ha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Xinjiang social stability and border security.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political geography; military geography; coast defense; border defense